

跨国移民与东亚现代化

——以中、日、韩三国为例

李其荣 沈凤捷

摘 要：跨国移民对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为中、日、韩三国提供了物质和人力资本，其商业网络促进了中、日、韩三国市场的扩大，并对中、日、韩三国政治结构的分化整合及文化结构产生了影响，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间经济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强，移民尤其是移民后裔越来越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在与他国公民交往和沟通的过程中建立起日益友好的民间联系；东亚各国的联系将会日益密切，东亚一体化终将会实现，而东亚也将在东亚各国人民互通有无、互相补益、互相协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类的力量，成功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跨国移民；东亚现代化；中国；日本；韩国

中图分类号：D523.8;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5-0021-10

作者简介：李其荣，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武汉侨务理论研究中心/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所武汉基地主任；沈凤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9）

东亚地区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它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东侵下，却经历了一段屈辱的历史。但在最近几十年里，东亚终于重新崛起，东亚现代化的进展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分重要的成就。日本、中国、“四小龙”、东盟各国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其现代化的规模和速度不仅远远高于欧美工业化的历史记录，也与当代中东、拉美等地区形成鲜明对照。这种“东亚奇迹”的历史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很多关于东亚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但是，具体从跨国人口流动的视角来探讨东亚现代化的著作或论文却很少。实际上，在东亚地区，造成东亚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跨国

收稿日期：2009-12-20

从地理上讲，东亚包括亚洲大陆东部的大陆、半岛和海岛。狭义的东亚仅指东北亚国家，即中国、日本、韩国、蒙古、朝鲜；广义的东亚除东北亚之外，还包括东南亚，甚至有学者将南亚也包括在内。就本文而言，主要集中于中、日、韩及周边国家的范围，这大体上是指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

关于东亚现代化的研究，学术界论述的角度比较多。（1）着重从东亚现代化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的视角来研究的包括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罗荣渠、董正华《东亚现代化》等；（2）着重从东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角度来论述的包括赵自勇《探寻东亚现代化的动力：内因和外因》，刘燕《东亚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分析及启示》；（3）着重从文化对东亚现代化的影响的角度来研究的主要有：张洪武《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及其启示》，乔瑞雪《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的探源研究》等。总体而言，学术界把重点放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东亚现代化发展模式、东亚现代化发展的因素等几个方面，而将跨国移民与东亚现代化联系起来的文章很鲜见。经检索中国期刊网，与此紧密相关的文章有：金永花的博士论文《外籍劳动力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了外籍劳动力对韩国产业发展、劳动力市场、中小企业的影响，指出外籍劳动力有助于韩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李路曲、李培广《全球化时代的移民对东亚的影响》一文指出跨国移民对东亚的社会结构及民主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罗纳德·斯凯尔顿《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一文涉及到了亚洲移民对亚洲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这些文章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移民激增。因此本文试图弥补这个缺陷,重点分析跨国移民对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现代化的影响。之所以选择中国、日本、韩国为特例,是因为中、日、韩三国在东亚地区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中、日、韩三国的发展道路代表了东亚现代化的三种不同类型。

现代化是社会系统的转化,它最根本的特征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即“从一个封闭的、平衡态或近平衡态的社会结构转变成一个开放的,远离平衡态,内部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的宏观流动与转换,因而拥有自我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的社会结构”。实现这种转变的最首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开放。只有社会开放,社会成分之间才能建立起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长程关联,产生大量成分间的协同动作,而且社会要素的种类越多,差异越大,社会结构的有序度就越高,形成的协同动力就越强,现代化就越成功。将此理论应用于移民研究中,我们认为非常适用,人口流动尤其是跨国流动必然能促进社会的开放性。不同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基因、技能、思想、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而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和通婚,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撞击,又会整合出新的人群和新的文化,从而促进了东道国社会要素的多样化。社会要素越多,就意味着系统离平衡态越远,那么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就越强,形成的协同动力机制就越大,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就越强劲有力。所以可以说,跨国移民是现代化动力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今,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越来越壮观,国际人口流动已逐渐作为一种社会转型的力量日益受到重视,它影响了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整个社会,以一连串不同且重要的方式重组国家与社会。对于东亚来说,在早期的后殖民和后二次大战时期,东亚几乎没有大的人口流动。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经济原因产生的国际移民对该地区国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亚洲国家之间的大量移民过程开始了。据调查,2003年在韩国的中国人占了韩国外国人的二分之一。近五年来,日本的华侨华人一直以平均每年5000人左右的速度增长,许多韩国人近年来加入了日本国籍,有许多还具有韩国人、日本人的“双重国籍”,而中国的日本人、韩国人也很多。跨国移民在东亚的大量出现,带来了资本的流动、市场的扩大、政治结构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多样化,这些要素都促使着社会结构向更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跨国移民将成为21世纪东亚社会变迁的最有力的动因之一。

一、跨国移民为中、日、韩三国提供了物质和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在经济生活中,资本包括物质资本(货币、自然资源和生产设备等)和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可以总结为:人口的迁移与恒定性流动是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跨国移民本身是一种人力资

目前中国已取得经贸大国的地位,日本在经贸和科技方面占有领先地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也在世界经贸体系中争得一席之地。但是,目前全世界几乎所有经济规模处于前30位的国家都加入了地区合作组织,唯独中、日、韩三国仍游离于地区组织之外。中、日、韩合作不仅对东亚经济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能提升东亚地区的地位,也对自身现代化进程有推动作用,其合作的必要性非常明显。所以本文选择中、日、韩三国为例,从侧面理解跨国移民对促进中、日、韩合作的积极意义。

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续篇》和《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中指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基本演变类型包括:(1)日本型。其特点是没有经历内部衰败,通过维新改革并以东亚其他国家的边缘化为条件迅速崛起。这是日本前期现代化的经历。(2)韩国型。其特点是衰败化与边缘化交织,经过殖民地时代的畸形增长和民族独立运动,然后走上现代发展的道路。(3)中国型。其特点是经历内部严重衰败化和半边缘化,通过革命重组国家和社会,走上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毕道村:《现代化本质——对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变化的新认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根据系统科学和耗散结构理论,客观世界都以系统形式存在,系统的开放是系统进化的首要前提。一个开放的系统,能够与环境间保持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导致系统成分的组合和破裂。这种内部结构变化使得系统失去稳定性,系统远离了平衡态,就变得对外部特别敏感,从而能激发出系统的创新能力,也能使系统跃进到某种新的有序状态中,系统功能得到大幅度提升。

参见 Stephen Castles,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2003. p. 21.

[澳]特萨·莫里斯·铃木:《越境移民与日本、东亚间合作的将来》,司韦译,《南洋资料译丛》2007年第2期。

参见梁茂信《“人力资本论”中的劳工迁移观分析》,《求是学刊》2007年1期。

本, 又能创造出物质资本。论及人力资本, 劳工移民的劳动力与技术、高科技人才的知识及智力资源都能创造出经济效益; 论及物质资本, 移民对母国的汇款以及移民对东道国的税款对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从整体上看, 移民也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

1、劳工移民的经济作用

劳工移民对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都产生了作用。对于母国来说, 劳动力迁出能够缓解国内人口和就业压力, 也可以实施一种“预谋战略”, 一旦在居住国实现了知识积累, 就可在回祖籍国后使用获得的技能来加强事业发展, 并将在外国获得的移民经验实现利益最大化; 对于东道国来说, 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需要大批技术劳动力, “而当地的技术劳力不是尚未形成, 就是供不应求”, 来自国外的劳工可以填补本地社会劳动力不足的空白, 也节省了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经费, 尤其是一些专业技术人才更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跨国劳工可以加强双边关系, 推动其他经济联系的广泛发展。

以韩国为例。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 经历了短短二十几年时间, 就从一个穷国迅速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 这期间跨国人口流动的贡献十分明显。在20世纪60年代, 韩国处于劳动力过剩、失业率较高的状态。当时国内劳动力大量输出, 这不仅缓解了韩国就业问题, 还赚取了外汇, 同时学习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促进了韩国的经济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 韩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同时又出现了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受到韩国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吸引, 一些东亚国家的劳动力开始流入韩国。其中中国劳动力自从1992年中韩建交至今, 逐渐成为韩国外籍劳动力的主力军, 加强了中韩两国的联系。这些外籍劳动力一般活跃于韩国劳动力比较短缺的农业、近海渔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部分服务业,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同时也增加了产业产值, 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据调查, 韩国外籍劳动力在各行业的工作, 共增加产业总产值10,393亿韩元; 并由于外籍劳动力的加入, 这些行业可增加雇佣韩国本地劳动力30777人。

日本的移民政策一向比较保守, 但在1990年到2003年间, 外国工人在日本劳动力市场所占份额几乎增长到过去的3倍, 达到了70万, 占日本劳动力总数的1.3%。电子机械、塑料、化工企业、建筑和汽车部件生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低工资的外国工人了, 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也是如此。据统计, 1997年至2010年间, 日本劳动力年增长率约为-0.3%, 要使劳动力供给适应需求增长, 日本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这些外来劳工, 尤其是专业技工。

中国的香港、台湾也非常依赖外来劳工。自20世纪80年代起, 香港劳动力市场就很紧张, 尤其缺乏建筑业和家政业工人,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几年, 每年流失的高技能和专业技术工人超过6.2万人, 所以香港吸收了许多外来劳动力。1997年, 外来劳动力在香港的参与率超过了89%。现在香港一些产业如捕鱼业、纺织业、水产业等仍然缺乏劳动力, 它还将继续依赖外来劳工。而台湾地区这几年来劳动力也很短缺, 并呈严重趋势, 外来劳动力的迁入缓解了这个矛盾。

由此可见, 劳动力在国家间的迁移可以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较合理的配置, 既可以满足经济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 也可以加速资源丰富地区的资源开发, 从而影响这些参与了人口流动的国家的经济发展, 提高了整个区域的福利水平。

参见 Wei Shen,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Gain - How China is Benefiting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gration?" p. 44, 引自“华中师范大学第四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9年6月。

[英] 罗纳德·斯凯尔顿:《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 祝东力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8月,第18卷第3期。

参见金永花《外籍劳动力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118-119页。

参见李昕蕾、任向荣《东亚国际劳工移民的流动性特征及其动力机制》,《东南亚纵横》2008年。

参见李路曲、李培广《全球化时代的移民对东亚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参见 [澳] Charles W. Stahl《东亚国际移民: 趋势与政策》, 殷鹏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移民汇款的经济作用

在评估移民对经济的影响时, 汇款总是占据首位。移民在国外的收入往往高于其在国内的收入, 其中相当部分成为汇款回到母国。汇款的经济影响主要有:

其一, 汇款不用支付利息, 不存在偿还压力, 可以有效地弥补国家外汇短缺, 减少国内贫困现象, 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稳定的外汇来源。中国收到侨汇的数值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仅 2007 年, 中国就收到海外汇款近 260 亿美元。大大增加了中国的外汇收入; 韩国 1973 年至 1982 年的外汇收入达到 40 亿美元, 仅 1981 年一年就达到 16.7 亿美元, 这些外汇为韩国扭转国际收支逆差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属于侨汇输出国, 在这方面影响不是十分突出。

其二, 汇款可以增加汇款家属的消费和储蓄, 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刺激本地产业; 而储蓄的增多可增加社会投资, 扩大产业生产能力, 从而增加国民收入, 有利于母国经济增长。如 1965 年至 1967 年韩国的劳务汇款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 13%,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由于劳务汇款的增加, 韩国私人消费增长达到了 0.3%,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0.24%。再如中国第一大侨乡广东省, 1978 至 1997 年, 侨汇收入高达 76 亿美元, 这些侨汇大多转化为生产性资金以及创业的启动资金。这 20 年里, 利用这些侨汇兴办的各类企业达 4.2 万家, 投资金额 17 亿元, 引进各种生产设备 3.6 万台套, 就业人员 55 万人。仅汕头一个市从 1978 年到 1999 年利用侨汇建立的侨属企业就达 10987 家, 产值达 135 亿元, 相当于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 27.36%。

3、移民人数增长的经济作用

近年的一些研究表明, 移民聚集会形成一种效应, 对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双边贸易产生正面影响。有经济学家使用“引力模型”检验美国与 47 个贸易伙伴在 1970 年到 1986 年的双边贸易后发现, 10% 的移民增加将带来 4.7% 的出口增加和 8.3% 的进口增加。把这个模型应用在加拿大与 136 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中, 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即加拿大移民人数的 10% 增长, 不仅使得加拿大对移民输出国的出口增长 1.3%, 又可使加拿大来自这些移民输出国的进口增长 3.3%。另外, 从更广范围看, 移民的增加甚至可以影响全球的经济收入。有资料表明, 如果移民数量的增加可以使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在 2025 年之前增长 3% 的话, 也就是说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移民能再增加 1500 万, 全球实际收入就可以增长 0.6%, 或增长 3560 亿美元^⑩。如

参见 [英] 罗纳德·斯凯尔顿《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 祝东力译,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 年 8 月, 第 18 卷第 3 期。

Dilip Ratha and Sanket Mohapatra 在 “Increasing the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The World Bank, November 26, 2007, p. 4.) 一文中指出: 官方人均汇款每增长 10%, 就会导致贫困人口比例下降 3.5%。

丘立本在《国际侨汇新动向与我国侨汇政策》一文中指出, 大部分汇款是海外移民用来赡养家庭而不是用来投资的, 因此较少受到资本市场的直接影响。即使是用来投资的侨汇, 海外移民一般不会因为家乡市场一时的变化而匆忙撤资, 他们会继续汇款支持已投资的事业。所以, 侨汇是稳定的外汇来源。

“华侨华人——中国的海外力量”, 新华网, 2008 年 6 月 11 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0614/09/13012_1333269.html

参见金永花《外籍劳动力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吉林大学 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25 页。

Zafar Iqbal, Abdus Sattar 在 “The Contribution of Workers' Remittances to Economic Growth in Pakistan” (Research Report No. 187, Pakista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2005) 一文中, 根据对巴基斯坦的案例研究指出, 汇款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每年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长 0.4%, 虽然这个研究结果还没有被证明适用于任何国家, 但至少说明了汇款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

参见金永花《外籍劳动力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吉林大学 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25 页。

参见龙登高《侨乡经济发展论纲》, 引自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574 页。

参见《国际贸易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综述》, 外贸指南, 见网址: <http://article.bridgat.com/guide/process/200804/114.html>

^⑩ 参见《移民与汇款》, 世界银行, 2009 年 5 月;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CH/NESEHOME/EXT-NEWSCH/NESE/0,,print=Y~isCURL:Y~contentMDK:21327100~pagePK:64257043~piPK:437376~theSitePK:3196538,00.html>

果跨国移民能按上述速度增加,它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要远远大于消除当今尚存的所有贸易壁垒。由此可见,移民人数的增长能够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但据调查,亚洲的移民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东亚的移民水平又低于亚洲平均水平,而东北亚的水平又低于东南亚,因此,东北亚的人力资源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劳动力和资金是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移民通过出卖劳动力及汇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且移民人数的增加对于一国来说,也存在着很大的利益潜力。所以各国在移民政策方面,应该改善移民过境、就业以及汇款的条件,促使本国最大经济效益的实现。

二、跨国移民的商业网络促进了中、日、韩市场的扩大

根据系统科学的理论,系统元素间的关联越长,交互信息越大;就越能弥补系统要素在数量方面的不齐全和质量上的缺陷,从而获得杂交优势,系统出现新质、新功能的机会就会越大,现代化动力机制才会越强大。因此,市场作为一个系统,当然是范围越大,包含的资源种类越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动力才越大。由跨国移民所形成的商业网络便是这样一种市场。从全球化的角度而言,国家可以说是对资源配置的壁垒,而跨国移民所建立的族群网络却突破了这层壁垒,他们通过跨国公司的形式建立了一个跨国界的广阔的市场,有助于技术转让和贸易投资联系的加强,使人们从中获取一个国家内部所没有的资源与要素的组合。正如龙登高教授所言:“网络与国家之间,不是你退我进或你赢我亏的博弈关系,而是相互补充与促进,能够互利双赢的关系。”在东亚,华商网络、日商网络、韩商网络是主要的移民经济网,它们不仅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更促进了东亚的整体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

1、移民所建立的跨国公司与母国国内市场的结合,促进了母国的经济发展。以中国为例,海外华商已经成为支持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20世纪80年代,海外华人企业到大陆的投资每年约10亿至20亿;之后投资数额不断增加,2000年时,中国接受外国投资的410亿美元中,几乎一半来自海外华人。目前据估计,我国利用外资总额中近60%来自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台地区;在海外投资企业数中,侨资企业约占70%。而且华商广泛的人际关系,可以为我国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帮助我国企业跨越国境,在世界范围内结合各种所需资源,加速我国企业的跨国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规则,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再比如韩国,虽说其移民远远少于华人,但是占韩国的人口比例却大大高于华人与中国人口的比例,近700万的海外韩人所占有的经济价值估计为1300亿美元,占韩国GDP的25%、出口总额的16%、进口的14%,尤其是韩国利用“韩商大会”帮助国内企业走向世界,并欲将在外同胞企业家升华为国家资产,据统计,第二届韩商大会对韩国就投资了2222万美元,第三届对韩国投资了49969万美元。

2、在这个地区性的流动空间里,三个移民商业网络都具备自身的特点,呈现出很强的互补性。网络的所有成员为了共同利益会自发联结起来,并通过相互之间通讯、亲善等领域的交流来

参见《移民人数史上最高滋生大量社会问题》,人民网2009年10月15日。<http://chinese.people.com.cn/GB/10196470.html>

参见李文《东北亚人口跨国流动与迁移的难点与问题》,《当代亚太》2001年第5期。

参见毕道村《现代化本质——对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变化的新认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龙登高:《人才跨国流动与发展——海外华商在跨越国家与制度屏障中成长》,载李其荣、谭天星《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研究(2006-2007)》,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参见 Andrew Bums and Sanket Mohapatr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4, February 1, 2008, p. 3.

参见谭天星《浅谈海外华商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1期。

韩商大会是自2002年开始召开的全世界韩民族企业家的盛会,主要致力于强化韩国企业及海外同胞企业之间的联系。

参见李丹《超国家民族经济网络的运营:华商大会与韩商大会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促进贸易、投资等各种交易活动,从而促进了网络的紧密程度,突破了各个网络自身的局限性。华商网络以人际信用关系为基础,在华商之间,只要相互信任,有的生意一个电话就可以成交,这样就不需要繁琐的法律程序,降低了华商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扩大了交易范围。而且华商网络更加注意商业化而不是技术化,它较少看重对技术权利的保护,更愿意向当地企业转让技术。另外,华商网络中,中国只是参与者,不是中心,它可以随意地与世界各地发展经济联系,赚取自己的利润。总之,华商网络具有更高的效率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日商网络与韩商网络很多时候离不开它的帮助。有资料说明,东亚地区不同产品的双边贸易增长有60%应归功于华人网络。相比而言,日商网络显得封闭化,决策更加谨慎和注重实利,日本企业在构建地区性生产网络的时候,非常不愿意与其他国家或企业分享技术。而韩商网络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韩国的民族主义要求海外韩人对韩国一定要有爱国心,这种由海外韩人发挥爱国心建成的以韩国为中心的韩民族群网络不能够像华商网络那样发挥更大更广泛的经济作用。不过,日商网络、韩商网络所具备的高科技、高水准专业人才的优势也是华商网络所需要的。

3、华商、日商、韩商网络分别与自己的母国中、日、韩三国国内市场紧密相连。通过移民网络这个桥梁,各个国家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使整个东亚成为一个区域生产贸易网络,相对降低了东亚各国对区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有利于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日本有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系,所有基本的商业基础设施和设备已经到位,其内部已经存在许多的外国公司;韩国在食品服务、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电子和精密工程、手机技术方面都很先进;中国有一个广大的市场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三国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有了更密切的经贸关系。在2005年华商大会上,很多非华裔企业家参加了会议,其中有800多名韩商。在此会议上,韩国吸引了约8.3亿美元的华商资金,韩商与华商之间达成的贸易额为5.8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目的地以及最丰富的进口来源地。2008年1月至3月,日本在中国投资了10.71亿美元,韩国紧随其后,在中国投资了10.57亿美元,三国的区域贸易占三国的贸易总额的55%。

在移民的作用下,东亚的移民网络与国家、网络与网络、国家与国家都建立了密切联系,促进了东亚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远远超过政府的作用和制度的安排,跨地域的庞大市场极大地提高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三、跨国移民对中、日、韩三国政治结构的影响

结构决定功能,结构发生变化,促使系统从平衡态向非平衡态转化;而系统只有在远离平衡态的时候才拥有自我发展的动力,从而才能提高社会功能。那么,在这条促使社会远离平衡态的道路上,跨国移民又发挥了怎样的政治影响作用呢?

1 移民影响了国家的政策制定

对于移民本身来说,他们与本地公民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更为紧密地与当地城市 and 社区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由此他们对自身的权利也要求得越多。他们会经常因为要求改变不平等的

参见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0, pp. 238 - 264. 见网址: http://www.amazon.com/Network-Society-Castells-Manuel-Information/dp/1557866171/ref=pd_rhf_p_t_1#reader_rhf

参见 Andrew Bums and Sanket Mohapatr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4, February 1, 2008, p. 3.

参见 [美] 乔万尼·阿里吉、(日) 滨下武志、[美] 马克·塞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 马援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第286页。

参见崔承现《华人网络与韩人网络的比较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参见 Chan Chao Peh, "Making in Road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Beyond Singapore", *The Edge Singapore*, May 28, 2007, p. 1.

参见李丹《超国家民族经济网络的运营: 华商大会与韩商大会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参见 CSC Staff, "China - Japan - South Korea FTA Saga: More Thunder, Little Rain, China Stakes", *Current Review*, May 5, 2008, <http://www.chinastakes.com/2008/5/china-japan-south-korea-fta-saga-more-thunder-little-rain.html>

生存条件或政治条件向政府请愿或抗议,引起政府的注意和重视;他们也会因自身不同的习俗和世界观影响到自身对待政治和政党的态度,从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团体,进而因相互之间的争论和活动促使很多社会改革运动的兴起;他们还会积极地参与政治选举,参与东道国的政治事务。

对于母国来说,移民不再仅仅被视为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安全阀,而是越来越被视为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重要的资金和人才资源。有些移民回国后还能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今天东亚各国的政界领袖也大多曾在海外受过教育。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政治的快速民主化,与其回国留学生的日益增多密切相关。所以输出国越来越重视他们的政治态度,而移民也往往不断地对祖国的政策提出批评。

对于东道国来说,尽管东亚国家一般来讲民族主义都比较强盛,不愿意本国社会政治多元化,但在现实面前,如果继续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把移居者排斥在公民社会之外,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移民问题可以成为国家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国家及地方政府必须关注和支持当地移民的利益,并为他们作出政策上的变化。以日本为例,迫于合法和非法的入境者在日本居留时间不断增加的事实,地方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如何防止在外国移民和日本人之间的摩擦,如何使非公民享受到日本人享有的福利等,有的地方政府还允许在公共场所使用多种语言。而且为了移民的方便,地方政府在报道当地事务时,除使用日语外还同时使用其他语言。地方政府通过这些政策,引导人们建立一种新型的“与外国人共存的社区”;有些地方政府还在试图绕过中央政府,而努力扫除为非日本人取得日本公民身份所设置的障碍。另外一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也为移民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在日本,据1997年的统计,有145个支持移民争取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在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来临后,非政府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为移民工人提供合法的保护。东道国对于移民的宽容或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的生存环境和东道国的制度,从而有利于民主的发展。

2. 移民影响了人们关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观念

随着国际移民的增加,国家边界变得更容易跨越,通过强制手段控制移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移民对国界和民族国家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占支配地位的关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发生了变化。

其一,移民的增加,使得东道国政府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经常性问题,当政府越来越把外国移民当作地方公民的时候,就如前文中提到的日本地方政府采取措施给予移民以当地公民的权利,人们那种把单一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主导观念以及一个人只能有一国公民身份的传统观念都会发生变化。开放地接受外来移民并使其在当地社会与本地公民平等的共生将被证明是一种可能的国家认同的形式。

其二,移民在东道国的稳定增长会形成一个个不同的族裔,居住地的开放,公民身份的授予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接受也都有利于形成族裔社区,这被看作多元文化社会的一部分。并且根据有关同化理论,族裔不是回归祖籍国的方式,而是成为当地人的方式,族裔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移民融入主流社会中上层。各种不同民族的移民群体可以按各自适应的不同方式同时生活在一个国家里,所以在东道国,族裔的多样化局面或许不会消失,人们那种多元化社会认同观念也会成定势。

其三,当代的跨国迁移并不仅仅意味着在一国定居下来,而可能是两国之间或多国之间的流动。像现在流行的“宇航员现象”、“空降子女”等术语都反映了这一形势,这种移民模式随着

参见李路曲、李培广《全球化时代的移民对东亚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参见 Stephen Castles,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2003, p. 32.

参见 Min Zhou, "Growing Up American: The Challenge Confronting Immigrant Children and Children of Immigrants", *Annual Reviews Inc.*, 1997, p. 73.

交通和资讯的快速发展也变得更易被接受。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新的心智地理’之中,没有什么距离”。由此形成的“既在这里也在那里”的两地或多地居留模式又使得跨国社群快速发展并普遍起来,从而动摇了有关领土国家及其公民生息于固定地方的传统观念,“使对聚居区的认同逐渐代替对国家的认同,当然这样的社群或聚居区很少形成能同国家抗衡的权力机构”。

现代化不仅仅是市场化,如果不对一国传统的政治结构进行全面的分化整合,也不能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动力机制。当然,在这条分化整合之路上,本国政府及统治阶级的作用才是至关重要的。东道国虽然或多或少认识到了移民的影响力,但对于移民的保护和宽容政策,目前也并不是非常乐观。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否认移民确实对母国、东道国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也影响了人们的认同观念,促进人们的观念由认同民族国家向认同聚居区和多元化社会转变。

四、跨国移民对中、日、韩三国文化结构产生的影响

东亚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肯定了东亚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其中的推崇和谐、集体主义、勤力节俭、重视教育等为东亚各国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独创的、富有活力的原动力。除了东亚传统文化本身所具备的经济动力外,我们也不可忽视移民的功能。因为现代化需要的不是同一的、停滞的文化,而是多样的、流动的文化;而迁移不仅是人类的一种迁徙活动,更是一种动态的社会文化变动过程。作为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的移民通过自觉不自觉的活动,将更多不同的文化因子带到了原有的系统中,增强了文化的多样与流动性,冲击了原有的文化结构,促进了系统的进化。

1、东亚区域内的移民流动促进了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也促使文化交流的各方从异质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促进新技术的出现,大大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从整体上说,东亚各国具有共同、共通的文化背景,即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但也不可否认,东亚各国的本土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所以存在文化交流的可能。早在公元前,中、日、韩三国文化就有了交流。7世纪后,朝日两国更是大量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宋代开始,朝鲜、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文化逆向输出也成为文化交流中的重要部分。到现在,随着移民潮的强势劲头,当代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更是迅速发展,成为促进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留学生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改革开放后,在东亚国家中,留学生交流迅速扩大。据新华社公布的教育部统计显示:2006年我国共接待来自184个国家和地区的162695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其中排在前两位的国家是韩国与日本。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很多,据调查,2004年中国留学生占日本外国留学生总数的66.3%。这些具有高素质的人才不仅有意识地在异国传播母国文化,维护民间的友好关系,也尽力吸收多国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更好的文化成果。例如旅日画家曹亚钢把中日两国的美学巧妙结合起来,出版了许多享誉世界的有特色的作品。

2、一个民族的成员从自己的祖国移民到异国他乡,是不会很快就脱离原有的民族文化而迅速融入侨居国社会的。相反,他在新的居住空间还会不自觉地受到原有文化的影响,从而保存了祖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就算经过侨居国民族长期的同化,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多

Peter F. Drucker, "Beyond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The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999, p. 1, <http://www.theatlantic.com/doc/199910/information-revolution>.

Ia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8, http://www.amazon.com/reader/0415259134?_encoding=UTF8&ref=sib%5Fdp%5Fp#reader.

[英] 罗纳德·斯科尔顿:《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祝东力译,《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2年3期。

参见梁志明《试论中国与东亚国家文化交流的特点与趋势》,《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2期。

参见李其荣、谭天星《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研究(2006-2007)》,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511-515页。

代, 在他们身上, 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他们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而且有研究证明, 融入主流社会与保存自身传统文化并不矛盾。保持传统文化可以保护移民子女, 促使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因此移民在东道国的长期居住, 有利于东道国形成多元文化社会, 促进文化结构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可以促使社会结构的宏观有序程度更高, 从而提高社会功能。正如美国一样, 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的领头羊, 成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社会能够吸纳和利用各种文化中最优秀的精华, 各种文化给美国增添的各种新成分、新营养不仅使它愈来愈多样化, 也愈来愈繁荣”。所以, 文化多元化一定能逐渐被东亚国家所理解和接受; 多重认同、多层公民权、双重国籍等或许都能成为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

3、随着多国间迁移的跨国移民的增多, 东亚区域内不仅仅只有东方文化内部的相互冲击和融合, 也存在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和融合。毕竟那些处于“太空人模式”的跨国移民所暂住的国家或曾经居住过的国家可能是西方国家, 理所当然地他们身上留下了西方文化的痕迹。类似于这种跨国移民所具备的文化元素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碰撞和协调的产物。通过他们的文化传播, 促使了东亚文化更深层次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更有利于东亚文化的发展。因为东亚共同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虽然有许多方面与现代化是契合的, 但也有某些部分阻碍着现代化的发展。不同于英国等西方“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 作为东亚这些“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来说,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可能更为激烈, 当儒家文化面临着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考验时, 我们不要敝帚自珍, 敌视变革, 把西方文化的传播当作文化渗透, 不要把简单的文化交流渲染上太多的政治意义; 亦不要把文化间的差异视为异端, 认为是无法接受和可憎恨的, 而要将其视为共同生活的试验, 其中包含着许多对全人类有价值的教导和信息。传统的儒学要想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必须汲取世界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 融会东西方文化之长, 对自身进行现代化的转换和重构, 使之成为符合现代精神需要的新儒学。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 它才能成为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动力。

其实,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人的自主性思想的发展, 人类各社会的发展也不太可能走一条一种文化同化另一种文化的道路, 而将是走一条自由选择文化认同并相互融合的道路。未来的东亚文化也应当是广泛吸取其他文化精华的一种革新了的东亚文化。所以, 移民通过促进东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 影响东亚地区的文化结构, 从而促进东亚地区文化的革新与发展, 使之与时俱进地成为东亚现代化的文化动力。

综上所述, 跨国移民是促进东亚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种重要力量。虽然学术界关于移民的影响有不同观点, 有人认为移民尤其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来说, 是社会危机的一个方面, 在此我们也并不否认; 但本文仍然认为移民的积极影响是占第一位的, 伴随移民现象更多的是融入世界市场和现代化建设。跨国移民为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提供了人力和物质资本, 扩大了交易市场, 影响了政治结构, 实现了文化交流, 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转型和进化。另外, 现代化社会最完美的表现是, “社会的各个要素、各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已融合成一个整体, 且这种联系和作用十分通畅而很少发生梗阻, 整个社会因而也就成了一个由众多不同要素的相互关联而

参见李未醉《加拿大华人社会内部的合作与冲突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95页。

参见 Yu Xie and Emily Greenma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 A Reformulation and Empirical Tes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Research Report 05 - 581*, August 2005, p. 4.

[美] 卡罗兰·卡尔金斯:《美国社会史话》, 王岱、程毓征译,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30页。

参见王蔚、陈燕锋《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 4期。

参见 Peres De Cuellar J. P., *Our Creative Diversity.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UNESCO, Paris, 1995, p. 25.

可参考李其荣《国际移民对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双重影响》,《社会科学》2007年第 9期。

Stephen Castles,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2003, p. 3.

组成的一个高度复杂和高度有序的生产力系统所组成的巨系统”。现在的东亚确实是在许多方面将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结合起来的移民相互交叉流动的地区, 频繁的跨国人口流动将东亚各国联系起来, 使生产要素在区域范围内优化配置, 促使东亚地区向一个有机程度高的巨系统发展。因而移民可谓是促使这种现代化动力机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 在这条由东亚区域化促进东亚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上, 也存在一些障碍。比如移民尤其是非正规移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东亚各国强烈的主权意识使得东亚难以形成类似于欧洲的超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体制, 东亚各国尤其是中、日、韩之间的历史恩怨导致国家之间缺乏整合机制, 安全互信的程度低, 等等。但是,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各国间经济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强, 移民尤其是移民后裔越来越快地融入当地社会, 以及越来越多的移民在与他国公民交往和沟通的过程中建立起越来越友好的民间联系, 东亚各国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密切, 东亚一体化终将会实现。而东亚也将在东亚各国人们互通有无、互相补益、互相协同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人类的力量, 成功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责任编辑: 李 申)

评审意见: 东亚现代化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重要课题。该文选择从“跨国移民”的角度切入对于东亚现代化进程的探讨, 是一个具有新意的研究视角。全文资料丰富, 条理清楚, 观点明确, 论证有力。

作者认为, 跨国移民是促进东亚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种力量, 并依次从人力资本、商业网络、政治结构、文化变迁等四个方面进行剖析, 论证当代在东亚大量出现的跨国移民带来了资本的流动、市场的扩大、政治结构的变化和思想文化的多样化, 促使社会结构向更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跨国移民因而将成为 21 世纪东亚社会变迁的最有力的动因之一。

作者还援引大量资料, 说明人口跨国流动必然能促进社会的开放性。不同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基因、技能、思想、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 而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和通婚, 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撞击, 又会整合出新的人群和新的文化, 从而促进东道国社会要素的多样化。社会要素越多, 就意味着系统离平衡态越远, 那么要素间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就越强, 形成的协同动力机制就越大, 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就越强劲有力。所以, 可以说跨国移民是现代化动力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章中若干有待改进或未来继续深入探讨之处, 不影响对于文章达到发表水平的结论。

评审专家: 李明欢,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Contents & Abstracts

Game for Existence in the Process of Eco-political Construction

Shen Chengcheng(3)

Abstract: The eco-political movements have prompte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y ar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a kind of eco-political model. China's reform, dating from the 1980s, has committed to the economic breakthrough while maintaining the existing political formation. Then it brings about the dilemma situation of "pollution first, treatment later", though this reform has brought new economic super-normal growth. Obviously, the frequent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legal crisis caused by "mismatch" of inefficient governance model have mad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co-politics. As a system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form, multi-game among the interests of subjects has brought about many variables to make this process "uncertain". The paper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co-political process, we should restore or dynamically interpret the interaction of the game, that is, selecting the main game, positioning its role, describing their game strategy and techniques, and finally, summing up the relevant conclusions, and making the total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eco-political process.

Keywords: Eco-political construction; Game; Intere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Visi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s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hi Congmei(13)

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areas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30 years ago, Chinese economic achievements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but its ecological security is not optimistic because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high risk. As a resul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lso needs a turn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ilur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 predicament of many factors. It suggests some specific way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hich contains eco-consciousness of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system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ivilized behavior.

Key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With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s Examples

Li Qirong Shen Fengjie(21)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ross-border migration to East Asia, especially its impact on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cross-border migrants have provided a physical and human capital in three countries; cross-border migration of business networks facilitates market expansion. Also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to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an impact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tegration of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structure, thus the migr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openness of society and pluralism. With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dependence between countries, immigrants, especially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society more quickly. More and more immigrants have created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on the base of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mong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East Asia can successfully mak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a modern one.

Keyword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Review on Researches of China's National Soft Power

Huang Jinhui Ding Zhongyi(31)